

中国经济学构建:20世纪20—40年代 中国经济学社的探索*

程霖 谢瑶

内容提要:目前围绕中国经济学社的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聚焦中国经济学社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关联性研究尚较薄弱。本文以中国经济学社1925年提出并被社员躬行践履的四条宗旨为出发点,基于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对该社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思想与实践探索历程进行全景式剖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学社在推进中国经济学构建过程中,呈现出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演进再到理论建构的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逻辑层次和演变路径。首先,学社重视编译经济书籍,这既表现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也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中,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其次是解析中国现实经济,为中国经济学构建奠定实践基础,并在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问题方面呈现出经济学研究中国化与创新性特征;最终目标是通过精深经济学研究以实现中国经济学之构建。中国经济学社的有益探索可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诸多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社 体系构建

一、引言

构建中国经济学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总结近代探索经验,从中获得有益启示,有助于加快此项工作的推进。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就萌生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追求,并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而经济学术团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正如方显廷所言,经济研究机构是推动“中国之近代经济研究工作”发展的一大主因。^①其中,中国经济学社是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团体之一,它以国内留美经济学家为主要参与者,同时汇聚了学、政、商界的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和“繁荣中国经济学著述的主力军”。^②该学社以“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四个方面为宗旨,^③学社社员从翻译书籍紧跟国际前沿,到著书立说解析中国经济,再到精深研究构建中国经济学,展现出一系列理论成果与卓越创见,“至是我国经济学由装饰品时代进入仿效与研究

[作者简介] 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邮箱:clin63@mail.shufe.edu.cn。谢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邮箱:xieyao61001@163.com。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7ZDA034),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资助项目“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与思想研究”(批准号:2020110932),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批准号:CXJJ-2021-3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① 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财政评论》第16卷第1期(1947年)。

②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1、349页。

③ 中国经济学社编:《中国经济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58页。

时代”,^①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学社的建立与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该学社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持续时间较长,经济学者众多,学术成果丰富,其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研究具备一定的系统性与代表性。因此,以中国经济学社为案例,围绕其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进行研究,对于进一步发掘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贡献以及充实和深化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综观现有文献,关于中国经济学社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关联性研究尚较薄弱。一方面,目前学界形成了一批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学术成果。例如,邹进文等以民国时期留学生群体为切入点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②程霖等从近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发展的角度,^③以及从概念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方法论等体系构建的角度,^④考察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张亚光等探究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的转型三阶段,即格义、分野、自立阶段;^⑤严鹏从经济学流派的角度探讨德国历史学派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产生的影响;^⑥郑娟等则从经济调查的角度探究中国经济学的兴起。^⑦这些研究各有其着眼点,但尚未从学术团体,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社的角度系统展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社的研究也积累了较为坚实的成果。著作方面以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为代表,该书对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历程、学术活动和社员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揭示了学社对近代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经济学社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叶世昌等合著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专辟一章对中国经济学社的马寅初、刘大钧等9位社员的经济思想和学术贡献进行了系统考察。^⑧研究中国经济学社的期刊文章则相对不多,且大都侧重于梳理该社及其年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缺乏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关联性分析,如孙大权论述了中国经济学社从创立到结束的兴衰历程及其产生的影响;^⑨郑会欣着重考察了中国经济学社第一届至第十六届的年会内容,并总结其演变特征。^⑩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启发,但未能直接而充分地探讨中国经济学社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问题,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置喙的余地。

本文以中国经济学社1925年规定的四条宗旨为出发点,基于对学社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对该社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进行全景式剖析,发现其探索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演进,再到理论构建的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逻辑层次和演变路径。首先,在理论学习方面重视编译经济书籍,一方面表现为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以掌握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与知识体系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优秀成果,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其次,对中国现实经济的解析,构成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实践基础。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并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问题方面呈现出经济学研

① 朱通九:《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1941年)。

② 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易绵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以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财经研究》2019年第7期。

③ 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

④ 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的考察》,《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张申、信瑶瑶:《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近代探索——基于研究内容的视角》,《财经研究》2020年第9期;张申、信瑶瑶:《近代学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文汇报》(上海)2020年1月17日,第W14版;信瑶瑶、张申:《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⑤ 张亚光、沈博:《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财经研究》2021年第1期。

⑥ 严鹏:《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

⑦ 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⑧ 叶世昌、孙大权、丁孝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⑨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经济学家》2006年第4期。

⑩ 郑会欣:《简述中国经济学社的年会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究中国化与创新性的特征。而后立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最终目标是通过精深经济学研究以探求中国经济学之体系构建。本文主要贡献表现为:(1)以学社四条宗旨为中心,全面深入地考察了中国经济学社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路径及演变特征;(2)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学社在中国经济学构建历程中累积的主要成果及理论贡献;(3)总结概括了中国经济学社在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经验与启示,以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注重外来引进与传统挖掘

经济学作为一门舶来学科,在近代中国呈现出“西学东渐”的明显特征,经济思想演进与经济学研究也表现出“移植性变迁”的重要特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和借鉴,是彼时学社社员了解并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准备,“如果连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都没有,又何来中国经济学”。^①同时,近代学者也未忽视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而是将其视作近代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即“我国而欲建立一适合国情之经济原理,自当采彼之长,补我之短。故吾人对于本国旧有之经济思想,亦当细加研究,评其得失;俾我国他日能产生一有统系之经济史。则将来世界经济史中,始能有我国之地位”。^②基于这一认识,学社社员在编译经济书籍与发表经济论文方面,展现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以及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

(一) 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

20世纪初,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原富》为名于1902年完成出版,^③标志着将西方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推动了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此时期中国留学生逐渐替代海外传教士成为翻译与引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力量,以留美经济学者为主的中国经济学社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大多有留学经验,如学社的前两任社长刘大钧与马寅初,以及学社刊物《经济学季刊》的两任主编李权时与唐庆增均于国外获得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社员大多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熟习经济学研究方法 with 理论体系,再辅之以语言优势,他们大量编译经济书籍,撰写经济文章,传播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

社员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引进方面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注重系统性与紧跟理论前沿。引进内容涵盖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新兴的美国制度学派等经济学流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方面,1924年史维焕等翻译了由埃德温·坎南著的《富》(*Wealth*),该书对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评述,译名为《富之研究》;^④张毓珊系统介绍了斯密《国富论》一书中的经济思想,包括分工与财富增加、物价与财富分配、经济社会制度等;^⑤刘秉麟在1926年的《理嘉图》一书中介绍了李嘉图的经济观念与经济学说,^⑥并译介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六部分的分配论,译名为《分配论》;^⑦1937年姚庆三介绍了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演变及其最新理论成果,涉及货币论、就业理论、公共建设政策、储蓄与投资、物价问题等。^⑧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在德国的经济学流派,其代表的“国家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代表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刘秉麟在1925年出版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一书中对李斯特的经济思

① 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法蠡测》,中国经济学社编:《中国经济问题》,第330页。

③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

④ 埃德温·坎南:《富之研究》,史维焕、陶因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⑤ 张毓珊:《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国立上海商学院季刊》第1卷第1期(1937年)。

⑥ 刘秉麟:《理嘉图》,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⑦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分配论》,刘秉麟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⑧ 姚庆三:《凯恩斯货币理论之演变及其最新理论之分析》,《国民经济月刊》第1卷第2期(1937年)。

想进行了详细介绍。^①朱通九系统论述了早期历史学派的李斯特、旧历史学派的罗雪尔、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等学者的经济观点。^②奥地利学派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主张运用边际主义来建立理论体系。张素民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说和价值理论;^③唐庆增系统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及其经济理论。^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产生了制度学派,该学派汲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着重运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李炳焕介绍了制度学派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凡勃仑、康芒斯两位制度经济学先驱的学说;^⑤陈炳权于1935年翻译了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米切尔(W. C. Mitchell)关于经济周期的论著,译名为《商情循环概论》(*Business Cycles*)等。^⑥此外,也有不少社员翻译了对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进行系统梳理的书籍,如1923年王建祖译述了法国经济学家基特(C. Gide)和里斯脱(C. Rist)合著的《经济学史》(*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⑦陈清华在1934年译介了奥地利学者斯班(Othmar Spann)的《经济学说史》(*Types of Economic Theories*);^⑧李炳焕等于1936年翻译了美国经济学者斯科特(William A. Scott)的《经济思想史》(*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等。^⑨可见,学社社员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呈现出系统化特征,并紧跟国际学术前沿,重视与世界经济学接轨,有助于缩小国内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差距。

其二,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研究并重。应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金融、会计、农业与国际贸易等应用经济学领域,与当时的热点问题联系紧密,反映出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经世致用”思潮。黄桔桐于1928年翻译了日本学者在农业方面的论著,译名为《农业社会化运动》;^⑩陈清华在1931年译介了克胥(C. H. Kisch)和爱尔金(W. A. Elkin)合著的《中央银行概论》(*Central Bank*);^⑪1933年李百强翻译了欧雪(F. Escher)的《国际汇兑》(*Foreign Exchange Explained*);^⑫许炳汉于1934年介绍了薛莱士(G. F. Shirras)的《财政学新论》(*The Science of Public Finance*)等。^⑬尽管经济学界充溢着重实用、轻理论的风气,但是学社社员并未忽视对理论经济学的输入与引进。除了前文所述的对西方经济学派和经济学者之学说的传播和探讨,也出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例如,唐庆增论述了西方学界关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指出经济学即“考察财富与人类之关系,研究人类生存竞争之情形”。^⑭李权时论及经济学可分为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易四部分,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方法互相协助而非互相阻遏。^⑮杨汝梅认为价值论是研究经济原理的中心问题,介绍了价值的概念、价值的构成要素、价值决定的费用说与效用说、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等。^⑯叶元龙围绕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劳动为价值的基础、劳动为价值的标准、价值是凝结的劳动等观点。^⑰张素民指出生产论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力、资本和企业,生产论涉及分工、生产劳力与非生产

① 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② 朱通九:《经济学家的四大派别》,《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③ 张素民:《奥国派之价值论》,《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
 ④ 唐庆增讲,孙荷曾记:《奥国学派之经济学说》,《经济丛刊》第2期(1934年)。
 ⑤ 李炳焕:《制度学派的经济学说述评》,《经济学期刊》第1期(1933年)。
 ⑥ 米切尔:《商情循环概论》,陈炳权译,正中书局1935年版。
 ⑦ 基特、里斯脱:《经济学史》,王建祖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⑧ 斯班:《经济学说史》,陈清华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⑨ 斯科特:《经济思想史》,李炳焕、黄澹哉、黄俊升译,黎明书局1936年版。
 ⑩ 河田嗣郎:《农业社会化运动》,黄桔桐译,上海启智书局1928年版。
 ⑪ 克胥、爱尔金:《中央银行概论》,陈清华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⑫ 欧雪:《国际汇兑》,李百强译,世界书局1933年版。
 ⑬ 薛莱士:《财政学新论》,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⑭ 唐庆增:《经济学之基本观念》,《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3年)。
 ⑮ 李权时:《纯粹经济学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⑯ 杨汝梅:《价值论与经济原理之中心问题》,《银行月刊》第8卷第2期(1928年)。
 ⑰ 叶元龙:《劳动价值论之研究》,《东方杂志》第19卷第9期(1922年)。

劳力、大规模生产、生产组织、固定成本等问题。^①李炳焕谈到分配公平问题,认为一方面要研究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研究欲望和效用,而当代西方分配论多以界限生产力为标准。^②如上所述,学社注重实用主义研究的同时不忽略纯粹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有利于增强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高度,对我国近代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进步和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应有裨益。

(二) 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方面得到了国人的高度认可,中国固有经济思想的源流已有几千年历史,“当西洋列国还没有萌芽之前,我们的经济思想早已在放着鲜艳的花朵了”。^③另一方面,也收获了西方学者的赞誉,如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施格(Henry R. Seager)在其为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写的序中就指出,儒学“是一伟大的理财体系,伟大的道德与宗教体系”。^④凯恩斯在1912年为《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中曾花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转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汉代贾谊、宋代袁燮、明代叶子奇等“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⑤学社学者在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时,除了发掘其思想的光辉成就,更能够以一个客观辩证的眼光去评价历史的得与失。例如,有观点提出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农轻商”“安贫乐道”等经济思想导致了中国的贫弱;^⑥另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未能形成一个系统学说,并揭示出古代经济思想家“为人生而研究学问之态度太盛,学术思想之发展,卒至受其阻碍”^⑦的现状,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

学社内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不乏其人。有学者以重要历史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司马迁自然主义的放任思想;^⑧李觏的国用与土地经济、富国与土地经济、强兵与土地经济等;^⑨王安石的市易法、青苗钱、免役法、对外贸易等;^⑩曾国藩的消耗思想、重农观点、币制与厘金思想等。^⑪也有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性研究,如王海波总体探讨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经济史观、欲望论、生产思想、交换思想、分配思想、消费思想、财政思想。^⑫甘乃光论述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经济观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思想产生早而经济学却成立缓慢的原因。^⑬1927年李权时采用古典四分法,分配、消费、生产与交易对上古、中古以及近古时代的经济思想进行爬梳与整理。^⑭值得关注的是,唐庆增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虽然,经济智识之内容甚奥衍,而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在纵的一方面,必须研究我国经济思想与制度之史的发展”,^⑮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基础性意义。

综上,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或大量引介西方经济学理论,博采众长;或挖掘中

① 张素民讲,陆钦棠记:《经济学中之生产论》,《商兑》第1卷第3期(1933年)。

② 李炳焕:《分配论的新趋向》,《商学期刊》(上海)创刊号(1929年)。

③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58页。

④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页。

⑤ J. M. Keynes, “Review: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22, No. 88 (December 1912), pp. 584–588.

⑥ 马寅初:《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银行月刊》第6卷第8期(1925年)。

⑦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13页。

⑧ 胡适:《司马迁辩护资本主义》,《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⑨ 邹枋:《李觏土地经济论纲领》,《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

⑩ 陶希圣:《王安石的社会思想与经济政策》,《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5年)。

⑪ 唐庆增:《曾国藩之经济思想》,《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⑫ 王海波:《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2期(1932年)。

⑬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

⑭ 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

⑮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第1页。

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值得珍视的闪光点,古为今用;或反思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不足之处,以史鉴今。这有助于学社社员理论素养的提升以及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基础:解析中国现实经济

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在掌握了较为系统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后,注重研究中国经济现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指引。正如马寅初所指出,“余总以为中国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应多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形、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①学社年会与学社刊物成为学社层面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渠道与有力载体。其中,学社年会侧重于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研究,学社刊物则重视经济问题与经济理论研究。学社社员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问题两方面呈现出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特点,并基于实践探索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经验,形成了具有创新性的经济观点与方法,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实践层面的理论要素。

(一)学社年会与刊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为了展现中国经济学社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概貌,笔者以学社年会及学社刊物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并分析年会中提交和宣读的论文^②以及《经济学季刊》刊发的论文,进而从整体视角把握学社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

1. 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学社从1927年第四届年会开始关注国内现实经济问题,并出现了以论文报告为形式的学术交流。本文统计的年会论文数量为1927年第四届年会至1943年第十六届年会中提交和宣读的论文,^③有效文章共计212篇,分类统计情况,详见图1。^④

如图1所示,学社各届年会论文研究主题的分布概况涉及了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其中,金融货币问题是最受关注的,共有37篇论文。该类文章关注的重点为币制改革与银行问题。对于币制改革,学者们分别提出了实行金本位制^⑤,有限银本位制^⑥,能力本位制^⑦等不同观点。在银行问题中,涉及对中央银行资本、准备集中、组织管理与营业方针的改进意见,商业银行对经济循环的影响,外籍银行势力的研究,农民银行根本问题的分析,实行计划的银行制度建议等等。

^① 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1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本文选择学社社员的年会论文而非各届年会讨论主题进行分析,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孙大权对1927—1943年的各届年会主题已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是一种纵向的分析;本文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按照年份进一步梳理分析社员年会论文的研究内容,实现了时间纵向与分类横向的双维度分析,可以更立体地呈现出学社年会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概貌,并且本文侧重于横向分类的研究,既实现了对孙著的补充与丰富,也可具体地回应社会实践。另一方面,采用年会论文视角也有助于与《经济学季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研究。

^③ 中国经济学社编:《中国经济问题》,第346页;中国经济学社编:《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66—267页;朱彬元:《中国经济学社第六次年会纪录》,《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朱彬元、许师慎:《中国经济学社第七次年会纪录》,《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中国经济学社编:《中国经济学社第八次年会指南》,出版地点和时间不详,第1—2页;王永新:《中国经济学社第九届年会纪详》,《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徐兆荪:《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纪事》,《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一届年会纪事》,《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二届年会纪事》,《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三届年会纪事》,《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中国经济学社编:《战时经济问题》,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五届年会开会详情》,《广大知识》第1卷第5期(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昨日举行年会——讨论战后经济问题》,《新华日报》1943年4月25日,第3版。

^④ 本文重在分析学社各界年会论文的主题分布与研究内容,基于现有文献资料可查找到212篇年会论文的具体主题。本文采取的分类方法是在各届年会对于会议论文分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与合并,将年会论文按研究主题划分为14类,分别为金融货币、财政、一般经济问题与经济建设、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会计、统计与物价、工商业与贸易、劳工问题、农村与土地经济、交通运输、国际经济与其他类。

^⑤ 张家骥:《中国币制改革之商榷》,《统计月报》第2卷第1期(1930年)。

^⑥ 刘振东:《有限银本位制》,《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

^⑦ 吴德培:《能力本位制之讨论》,《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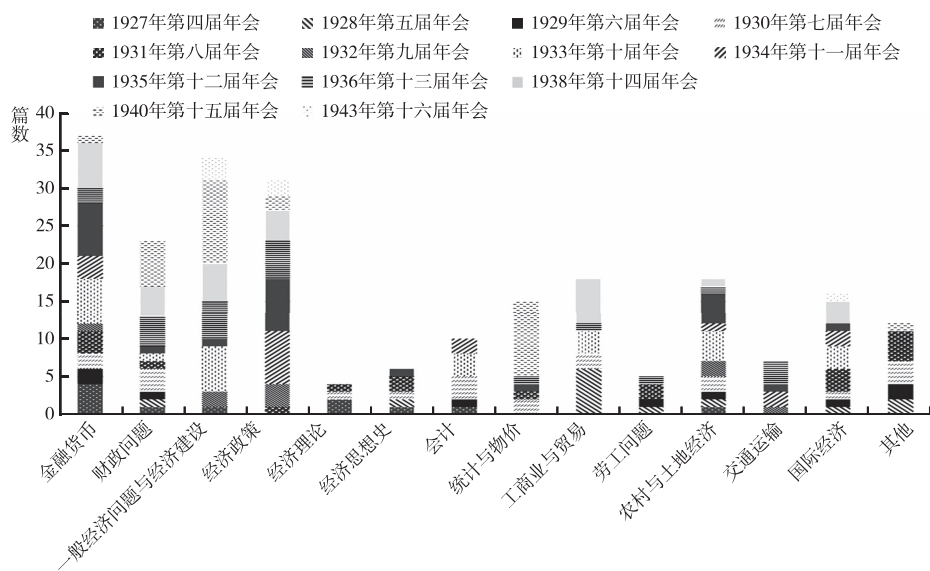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经济学社年会论文研究主题分类统计

一般经济问题与经济建设研究的文献数量有34篇,仅次于金融货币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后四届年会,由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中国正处于举步维艰之时,国际外敌侵略、国内时局动荡、民生凋敝的形势,引发了国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与经济建设的热切讨论。该类文献的内容,主要涉及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西南经济建设,前者包括战前时期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准备,^①战争期间消费、生产、人力与资金的统制,^②战后经济建设中向工业化迈进面临的“如何大量动员国内私有资本,而同时能防止资本主义的抬头”以及“如何大量吸收国外资本,而同时能保护国民的产业”两大问题。^③后者论及了开发西南实业与救济国难的关系,西南经济建设的四大要素,西南经济建设的工业化途径,^④西南经济建设中面临的障碍与补救方法、民生主义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实施、生产部门的适当配置以及专管机构的设置。^⑤

经济政策类相关论文有31篇,位列第三,主要出现于1934年、1935年和1936年的年会,归因于这三次年会主题均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其中,1934年年会论文中的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年会主题“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展开,研究内容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将统制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进行对比,如比较计划经济政策与统制经济政策,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情势异常恶劣,应采取统制经济政策。^⑥再如将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与技术经济三种经济形态作对比,认为中国的国情既不满足计划经济的前提——生产公有,也不满足技术经济的前提——机械使用之普遍,因而更适宜采用统制经济。^⑦二是对统制经济实施前提与方法进行探讨,认为统制经济的实施需要确定政治的步骤,提高市场经济各要素效率和建立统制经济之政治机构等三大前提。^⑧统制包括生产经济统制、交易经济统制、分配经济统制、消费经济统制四大类。^⑨1936年年会论文中的经济政策以“非常时期之经济财政

① 陈行:《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
 ② 姚铁心:《战时经济论》,《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
 ③ 章乃器:《我国战后经济建设的两大问题》,《中农月刊》第4卷第6期(1943年)。
 ④ 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第1卷第2期(1938年)。
 ⑤ 史维煊:《西南经济建设管见》,《时事类编》特刊第27期(1938年)。
 ⑥ 邓峙冰:《中国统制经济应取之政策》,《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⑦ 吴德培:《统制计划技术三种经济与中国》,《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⑧ 葛豫夫:《中国实行统制经济之条件与办法》,《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⑨ 李权时:《政府应统制何种经济》,《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问题”为中心,社员从不同角度切入,提出关于非常时期经济财政问题的若干政策主张。财政政策包括发行纸币,开辟税源,募集内债,举借外债,移徙资金,还可辅之以邮政加价,提高奢侈品税率,提高印花税税率,举办备战储金,募救国捐等。^①在物价制度方面提出最高价与最低价、用途等级法、定量分配法、物价与居间业之关系四种物价统制方法。在纸币政策上主张对纸币实施统制,反对以纸币政策作为战时筹款的不二法门。^②劳工政策涵盖了工会政策、工资政策、工业安全与工厂检查、劳动灾害与赔偿、集体的劳动协约、调解与仲裁制度。^③交通经济政策涉及铁路、汽车路、国内外水道及航空的相互联运,收回铁路管理权、国内外水道航权、航空权等等。^④可见,学社在研究经济问题之际,对统制经济及非常时期的经济政策已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周详的勾勒。

农村与土地经济类共有18篇论文,主要涉及如下四类问题:一是农业问题的分析与农村经济的复兴之策。主要从统制国外农产品之输入,^⑤开展农业调查、发展农民组织、改良品种增加产量、兴办水利、提倡农村副业、推广农村放款等方面提出对策。^⑥二是对农村农业的调查与统计。涉及对中国垦田的统计、中国农业的调查。^⑦三是注重农村经济与实业的研究,农村工业与乡村建设问题。^⑧四是土地经济研究。着重对土地金融问题与筹设土地金融机关原则的分析,^⑨对土地村有制度的批评以及对土地政策的实施建议。^⑩

2. 中国经济学社刊物。中国经济学社为了深化中国经济问题与经济理论研究,创办学术刊物《经济学季刊》,李权时在《发刊辞》中表达了“庶几中国之经济学刊物,或可以登世界学术之林矣”的愿景。^⑪经济学界的专门研究抑或实地调查结果,均发表在中国的经济期刊上,^⑫而《经济学季刊》作为“国内经济刊物之代表”,^⑬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理论发展的重要载体。该刊从1930年创立到1937年停办,共出版了8卷29期,共计文章352篇。^⑭统计数据如图2所示。^⑮

金融货币类文章亦占《经济学季刊》论文最大比重,共计54篇,除了关注币制改革与银行问题,还呈现出其他两个特点:一是对信用与信托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征信所的目的、重要性、信用分等,中国征信事业的过去与未来改进,信用调查的组织、范围、分类、资料整理、资料识别及编制。^⑯信托业务的分类,如遗嘱信托、人寿保险信托、发行公司债信托、社会信托等。^⑰二是对纸币问题的讨论,

① 熊凌霄:《非常时期之财政》,《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

② 马寅初:《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与纸币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

③ 陈振鹭:《非常时期之劳工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

④ 吴德培:《非常时期之交通经济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

⑤ 贾士毅:《复兴农村应实施农业保护关税》,《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

⑥ 胡元民:《抗战建国中之农业经济政策》,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版。

⑦ 童蒙正:《浙江全省省县地方田赋统计》,《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2期(1936年)。

⑧ 方显廷:《中国乡村工业与乡村建设》,《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

⑨ 章午云:《今日我国应采之土地金融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

⑩ 朱通九:《土地政策的检讨兼评土地村有制度》,《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

⑪ 李权时:《发刊辞》,《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

⑫ 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财政评论》第16卷第1期(1947年)。

⑬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75页。

⑭ 《经济学季刊》的作者既有学社社员,也有非学社社员。由于是以《经济学季刊》为切入点,社员与非社员发表的文章都属于《经济学季刊》的成果,对发表的所有文章进行分析有利于整体反映《经济学季刊》研究主题与研究内容的概况。此外,非学社社员发表的文章也经过学社社员的编辑处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社的学术关注点。

⑮ 孙大权教授《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一书对《经济学季刊》刊载的文章进行了总数统计(350篇)与分类统计。本文在总数统计方面,借助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以及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发现共计文章352篇,其中第一卷47篇,第二卷49篇,第三卷38篇,第四卷46篇,第五卷57篇,第六卷48篇,第七卷58篇,第八卷9篇。在分类统计方面,孙著划分了20类,种类较多,本文的分类是在年会论文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史、书报评论与介绍两类。本文尽量保持《经济学季刊》论文与年会论文划分类别的一致性,以更好地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

⑯ 王维骥:《征信问题与信用调查》,《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1期(1935年)。

⑰ 朱斯煌:《信托业务与信托公司》,《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1934年)。

重点考察了近代中国现有纸币的种类、纸币发行渐广之趋势、纸币准备的确立、纸币流通现状。^①近代中国10个银行1921年至1934年的纸币发行数量与纸币流通地域等。^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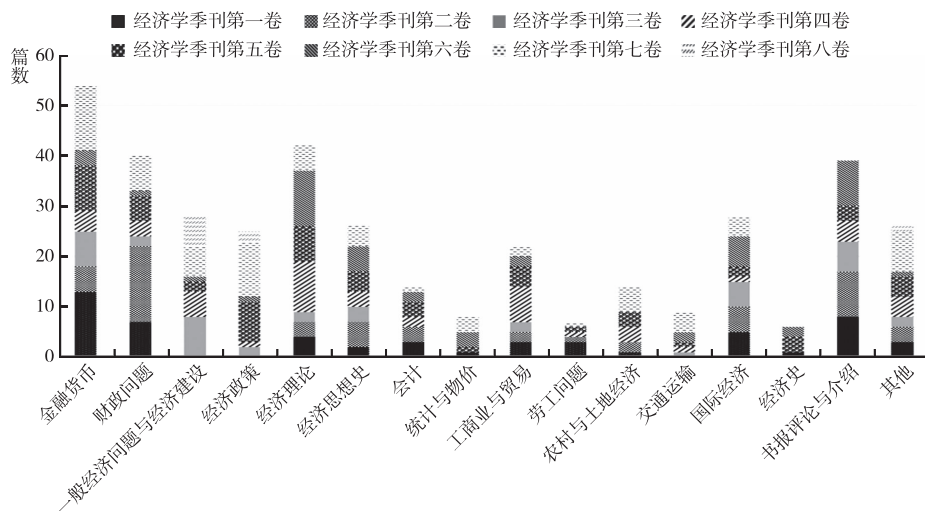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学季刊》论文研究主题分类统计

财政问题也是《经济学季刊》关注的重点,共发表了40篇文章,列于第三位,^③主要集中在税制研究,内容涵盖广泛。在营业税方面,有学者讨论了营业税在租税系统中的地位、^④营业税的性质与起源、课税标准及其方法、重复税、归宿问题等。^⑤ 所得税方面,探讨了所得税的意义、沿革、先决条件、课税范围、定率问题等。^⑥ 关税方面主张关税征金,但不以进口货之金价为标准,^⑦也倡导实施相当的保护关税,并非极端的保护关税。^⑧ 还有学者研究了遗产税的理论基础、举办必要及实施面临的问题等。^⑨

综而论之,学社年会论文的前三类研究主题分别是金融货币、一般经济问题与经济建设、经济政策,反映出年会注重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探讨,其得益于学社社员构成的包容性与多样化,涵盖学、政、商各界人士,社会影响力较大。同时,政府对学社社员的经济意见颇为重视,为社员的经济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经济决策之参考提供了便利,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社的独到之处。《经济学季刊》发表文章的前三类主题分别为金融货币、经济理论与财政问题,侧重经济问题与经济理论研究。金融货币问题位列年会与《经济学季刊》论文研究主题统计中的首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赵兰坪所言,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下,金融问题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影响至为重大,^⑩研讨与解决中国金融货币问题就尤为迫切。此外,不论是年会论文还是《经济学季刊》中的文章,都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具有差异性,论文的研究内容也随实践不同而发生演变。简

① 杨荫溥:《吾国纸币之现状及其问题之探讨》,《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4年)。

② 唐庆永:《近几年来吾国之纸币》,《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4期(1937年)。

③ 《经济学季刊》发表文章的前三类主题分别为金融货币、经济理论与财政问题,为了更好地聚焦于各章的考察内容,本文将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整合到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注重外来引进与传统挖掘”进行论述,本部分则主要围绕现实经济问题展开。

④ 马寅初:《营业税在税制上之地位》,《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李权时:《中国目前营业税问题概貌》,《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

⑤ 侯厚培:《营业税问题之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

⑥ 毛起鹄:《中国所得税问题》,《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

⑦ 马寅初:《关税征金与改革币制》,《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

⑧ 李权时:《中国关税政策商榷》,《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

⑨ 黄豪:《中国遗产税研究》,《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2期(1934年)。

⑩ 赵兰坪:《十年来吾国金融问题之回顾(上)》,《时事月报》第22卷第1期(1940年)。

言之,年会与《经济学季刊》作为学社层面解析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阵地,相关研究立足于中国现实经济,与实践相结合,为构建产生于中国实践的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基础。

(二) 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与创新性

现代经济学在基本原理方面具有一定的通约性与普适性,但在应用研究方面有其特殊性,需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现实。马歇尔曾提出,“经济分析和一般推论虽然应用很广,但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①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知晓舶来经济学有其适用边界,并非完全适合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必然存在本土化适应与中国化改造的过程。更进一步,基于中国经济实践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经验,让实践成为经济理论创新的源泉,使得具有创新性的经济观点与方法产生于本国实践,对实践进行指导,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实践基础。

纵观学社社员讨论现代经济问题,解析中国经济实践,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问题两个层面体现出经济学研究中国化与创新性的特征,也显示出学、政、商之间的交互影响。^②其中,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表现为学与政的有机互动;微观经济问题分析则反映了学与商的紧密联系。

1. 宏观经济政策之中国化与创新性。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窘迫形势,学社作为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肩负着改造中国经济、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时代使命。学社吸纳了如宋子文、孔祥熙等不少政界人士,学社社员也在政府诸多机关部门中担任要职,在经济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等宏观经济问题方面进行研究,促进了学术主张转变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反映出学界与政界的互动,也显示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特征,深化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立足本土实践、具备中国特质、具有原创性的经济观点。

彼时,世界经济正值激变之际,中国经济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盖现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即在决定一种最合乎国情和最合乎公理的一种经济制度也”。^③学社社长马寅初于1931年指出,“极端资本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极端共产主义亦不适用。我们应舍短取长,采行第三途径。即一面作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产制度”。^④计划生产与私产制度共存这一观点旨在将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相结合以设立一种新的制度。李权时在《统制经济的基本理论》一文中谈到,除一般学者主张的土地、劳力、资本与企业家四种生产要素外,首倡将国家列为生产要素之一,提出“现在所谓的统制经济,就是把国家作为生产要素之一”,^⑤反映出李氏对统制经济的独立思考与独到见解。

关于货币制度,《经济学季刊》在第1卷第2期确立“币制建设”主题以讨论中国币制改革与建设问题。其中,社员刘振东创立了一种新币制——有限银本位,主张统一币制、统一造币厂、废止自由铸造、统一纸币发行权,以限制货币数量为维持币价的手段,使银块价格与银币价格判为二事,互不影响。在国际汇兑方面,使将来本位货币银元的价格,不以银块价格为标准,而以国内的购买力为根据,即以购买力平价代替两种金币间的常平汇价。他总结道,有限银本位“可以使国际经济上开一新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陈瑞华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② 孙大权教授《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一书对学社的“政、学、商互动”这一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涵盖了学社的干政愿望、对国民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的影响、工商界对学社的支持、学社为工商业出谋划策等,这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在学社对政界、商界产生的影响上,孙著更关注学社社员参与政府决策,并促成一些政策的落地实施以及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本文则更侧重于发掘学、政、商互动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研究两方面的中国化与创新性特征,以及实践与理论交织下的中国化与创新性成果构成了中国经济学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元素。

^③ 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例言”第1页。

^④ 马寅初:《资本主义软共产主义软》,《东方杂志》第28卷第24号(1931年)。

^⑤ 李权时:《统制经济的基本理论》,《上海邮工》第6卷第3期(1933年)。

局面”,成为“世界实行理想货币的前驱”。^①

财政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热点之一,社员针对当时的财政实况,实现了对财政学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与创新性发展,为财政制度的改革献计献策。卫挺生基于“明清以降,计政与财政合而不分,故虽严刑峻法,而仍不能防止官吏之贪污营私”的现状,^②意识到分工合作与内部牵制的重要性,提议财政制度改革,确立的主计制度具有“超然”“联综”“连环性”“隶属”四个特征,实现了组织的内部牵制与监督,是当时具有原创性的一种制度,“主计制度为各国所无而中国创之”。^③主计制度被政府采用与实行,“虽成立不久,但已有相当成绩”,^④也有社员认为其遭遇诸多阻碍而未能充分推行,实施效果欠佳,^⑤但是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还是值得肯定的。

2. 微观经济研究之中国化与创新性。彼时,中国经济学社除了吸纳政界人士,也与工商界展开广泛合作,注重微观层面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与创新性研究,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工商界的企业主体提供学理支持与智力支撑,甚至对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在科学管理理论方面,杨铨在《科学管理法之要素》一文中指出,“所贵有科学的管理法者,在因地因事而制宜”,并谈到,“我甚希望有一种中国式之科学的管理法出现也”。^⑥穆藕初留美归国后译介了美国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⑦,并形成了不同于泰罗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较少关注人的因素之管理理论,而是立足“社会人”进行分析,发扬人的积极性与能动性,重视教育培训对提高员工素质与技能的作用,这不仅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发展了泰罗的管理理论,也反映其在吸收借鉴西方科学管理理论时有机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理念,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他建立了一套科学化与规范化的管理方法,应用到自己创建的德大、厚生棉纺织企业之中,在当时的国内尚属首创,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益,引致其他企业纷纷效仿,进而推动了中国企业的近代化历程。^⑧

在企业会计方面,社员徐永祚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会计理论对中国传统簿记进行改良,“采用世界最新学理,根据中国固有制度,以最经济最适用之方法,改良中式簿记”。用西方簿记中的账簿分割法与统辖记账法改良中式簿记,用本国记账的收付簿记法和结账的四柱结算法代替西方簿记中的借贷簿记法和平衡结算法。^⑨其对中式簿记的改良不同于改革派对西式簿记的全面引进,而是立足于中国实践,更具有本国特点,因此在工商企业中运用更为广泛,对改善中国工商界落后的会计境况大有裨益。徐永祚对中式簿记进行改良的尝试被认为具有“建立中国式会计模式的探索精神,与80年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⑩此外,杨汝梅所著《无形资产论》探讨了无形资产与商誉性质、各类无形资产间关系分析与会计处理方法等,有助于企业会计实务中无形资产疑难问题的解决以及理论层面会计学的发展,“在世界会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⑪

经济学的产生、成长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反之,经济学也需要服务于经济实践。毫无疑

① 刘振东:《有限银本位制》,《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

② 卫挺生:《民国计政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

③ 张国藩:《中国主计制度之研究》,《会计季刊》第2卷第4期(1936年)。

④ 陈长衡:《我国创立超然主计制度的用意》,《铁路杂志》第1卷第6期(1935年)。

⑤ 朱通九:《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1941年)。

⑥ 杨铨:《科学管理法之要素》,《科学》第7卷第4期(1922年)。

⑦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穆藕初译,中华书局1916年版。

⑧ 唐任伍:《论穆藕初对科学管理思想的传播和实践》,《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年第3期。

⑨ 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之管见》,《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2期(1934年)。

⑩ 方圆:《中式簿记改良倡导者:徐永祚》,《财会通讯》2012年第16期。

⑪ 赵友良:《关于无形资产若干问题的探讨——为纪念杨汝梅氏著〈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70周年而作》,《财会通讯》1996年第8期。

问,中国经济学应当服务于中国经济与发展问题的解决,其中不仅仅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也应当为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力图实现学、政、商三者的有机互动。基于中国宏观与微观经济实践进行经济理论创新,并在实践过程中检验与发展经济理论,推动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国化与理论原创性,为进一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来源于实践层面的理论要素。

四、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精深经济学研究

随着西方舶来经济学理论的日渐传播,中国化的历程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学界也面临着已有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决本国经济问题而萌生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如夏炎德在总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时所言,“一般新进有识的经济学者对于至今流行的经济学说不能引为满足,他们企图针对着新环境与新需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的新体系。”^①中国经济学社社员谭熙鸿在1928年的杭州年会中也谈到,“但为吾国前途计,更盼贵社于理论方面,将来别成中国一派”,^②发出了国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的先声。再如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名誉会长胡汉民在1929年的年会中所述,“惟经济学术,在国内甚属幼稚,希望社员积极研究经济学术,以期与各先进国并驾齐驱”。^③学社于1930年年会的社务会议中,通过了一项“社员应努力使经济科学自立,并经济图书中国化”的提案,^④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学建立的工作。这对于社员后期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探索有着启蒙与引导之效,并涌现出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一) 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世间无论何种科学,皆自有其基本概念”,^⑤其概念对于了解该科学的特殊性质意义重大。于中国经济学而言,概念的界定与其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要素密切相关。概念的不断清晰与统一则对廓清学术分歧、规范研究过程以及发展中国经济学裨益良多。^⑥

社员尽管同处于一个学社,却从不同角度、不同形式探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问题。1930年何廉指出中国的经济研究,不仅在于明晰经济学原理,更贵在“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如此才能称为中国化的经济研究。^⑦可见,何氏认为中国经济学应当注重本国具体国情,以谋求本土经济问题的解决。程天放于1932年的学社年会中表示,“能本中国固有之经济思想学说,参以近代各国之新兴之理论,融合而贯通之,成为中国之经济学”,^⑧该观点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的构成方面,应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内核,参照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实现二者的融合。唐庆增于1936年指出“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⑨此观点强调应立足于中国特殊的经济问题研究,从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智慧与吸取教训,采用西方经济学说有益成果,并着重强调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性。1937年刘絜敖谈到,“今国人既如此崇尚实利而鄙弃理论,故其足以阻碍科学发达之前途,而致我国经济学永远停止于‘经济常识大全’之境。”^⑩马寅初指出刘絜敖把“中国经济学”进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于“一般经济学者,重视经济问

① 夏炎德:《中国经济学之过去与现在》,《文化先锋》第4卷第9期(1944年)。

② 《中国经济学社第五届年会纪录》,中国经济学社编:《经济建设》,第275页。

③ 朱彬元:《中国经济学社第六次年会纪录》,《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

④ 朱彬元、许师慎:《中国经济学社第七次年会纪录》,《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

⑤ 唐庆增:《经济学之基本观念》,《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6期(1936年)。

⑥ 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⑦ 何廉:《发刊词》,《经济研究周刊》第1期(1930年)。

⑧ 王永新:《中国经济学社第九届年会纪详》,《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

⑨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4页。

⑩ 刘絜敖:《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页。

题的研究,而忽略经济理论的探讨”。^①该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又提供了新视角,即中国经济学不应只着力于经济问题研究,也应重视经济理论研究,以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深度与高度。1947年方显廷在理论方面希冀我国经济学术研究能产生“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的著作”。^②该观点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体系性。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各抒己见,共识与歧见并存,尽管未形成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统一界定与高度共识,但是将已有观点与主张进行归纳总结,也可描绘出这一时期学社社员关于此问题的大致轮廓,并提炼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即中国经济学在研究主体上应为中国人;在研究对象上既要注重中国现实经济之考察,也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借鉴西方的学理研究,并从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汲取智慧;从而建立一种立足于中国之特质而探究中国经济发展与演变,并具备创新性与体系性的经济学理论。

(二)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主要用来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而经济学方法论可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③它是经济学视域下理论研究的基石,是分析经济问题的工具,也是经济学学科得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原因。

经济学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逐渐被学社社员所认识,如刘絮敖指出,“我国今日亦正病方法论研究之缺乏,而致吾人之经济学入于歧途,故著者甚愿国人充分了解方法论研究之重要性,然后期以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的工夫,起而在方法论上奠定一个深固的基础,以谋我国理论经济学之独立的发展”,^④深刻揭示了方法论研究对我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学社学者也是各抒己见。祝伯英提出“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和研究其他国家经济的方法相同,“并不需要特殊的脱离一般的方法”。^⑤朱通九总结道,“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如数量分析法、演绎法、归纳法、比较法等,可“为分析我国经济现象之工具”。^⑥可见,此类观点更强调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主张运用国际通行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我国经济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学社社员并未停留于固守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杨端六提及两项经济学研究方法,“一是理论的探讨,一是实际上的调查”,^⑦社员在这两方面均体现出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意识。刘絮敖著文谈到,“方法论既为构成独特学说体系的基础,故吾人如亦欲建树一独特之学说体系,如亦欲谋我国经济学之独立发展,除对于方法论彻底致力外,别无他路可走的”,揭示出因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出的学说体系的独特性,反映出其对我国经济学之独特方法论的追求。他也提出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四种涵义,即宇宙观、认识论、研究法与叙述法。其中,宇宙观与认识论对“建树吾人独立之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叙述法则对“吾人为达到独特体系之表现目的”具有重要影响。^⑧如果说刘絮敖关于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偏向理论化,那么何廉则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创新了中国经济调查的研究方法,推动了社会调研的有效进行。在采用西方问卷调查法调研中国经济问题时,由于研究对象知识水平有限、出于隐私保护等原因不愿合作而导致调研结果的收效甚微。何廉意识到典型提问与普遍调查方法在中国的不适用性,主张探索一种新研究方法,形成了具备创新性的“教授负责制”调研方法,即一个项目由一个教授负责,配备专业的研究助手,结合广泛研究与典型研究法,

① 马寅初:《我国预算法币与工业之连锁关系》,《银行周报》第21卷第18期(1937年)。

② 方显廷:《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银行周报》第31卷第4—5期(1947年)。

③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页。

④ 刘絮敖:《经济学方法论》,第5页。

⑤ 祝伯英:《研究中国经济之方法》,《学术月刊》创刊号(1933年)。

⑥ 朱通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

⑦ 杨端六:《刊前词》,《四川嘉定战时物价特刊》卷期不详(1941年)。

⑧ 刘絮敖:《现代各家经济学说方法论之分析》,《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4期(1936年)。

并建立实地工作站,^①这进一步丰富充实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是留学于欧美学习经济学的群体,他们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系统的分析方法,并能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来解析我国的经济现象。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并没有固守舶来经济学方法论,而是对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调查研究方法作进一步探索与创新,为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方法论支撑。

(三) 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探索

随着概念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再加上发展中国经济的现实需求,经济学界也在进行着具有中国特质的经济学体系的探索。何谓体系,它包含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应该具备一定的“范式”要求。^②托马斯·库恩指出,“范式”是由概念、定律、理论、方法、模型等构成的整体,并具有一定的公认性。^③学社社员主要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研究体系构建方面进行探索,涌现出不少代表性成果。下文将通过案例形式进行说明,其中理论经济学层面表现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用经济学层面涉及中国财政学体系的探索。^④此外,还围绕经济社会转型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经济理论体系创新的探讨,即工业化思想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

1. 民生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民国时期基本经济理论主要有三大派系,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民生主义经济学。其中,民生主义经济学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重要成果。^⑤中国经济学社社员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植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民生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探索,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体系化与现代化。

就借鉴西方经济学范式进行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体系探索而言,主要表现为大量吸收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经济理论著作的问世。其中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有1928年刘秉麟的《经济学》和1943年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其著作借鉴了古典经济学四分法的研究体例,具备了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并在经济学术立场、经济研究方法与基本理论观点等方面展开系统论述。

由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满足现实经济的需求,如以“经济人”“完全信息”为假设、以个体主义为方法论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鉴于此,学社社员并未止步于单纯地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范式与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具体经济问题试图探寻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民生主义经济学。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指出“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在民生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此种经济学是关于“国计民生”“经国济民”的研究,“与一般所谓用最少的劳费时间,获得最大酬报的经济原则,绝不相同”,^⑥并且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一系列概念术语,如“民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均贫富”“调和”“养民”等等。彼时,学社社员对民生主义经济学展开了热切讨论与系统考察,涉及思想渊源、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经济制度等方面,也谈及该体系的独特性和适用范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社员徐青甫阐述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民生主义,来源于吾

① 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② 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

③ Thomas Samuel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10.

④ 关于应用经济学方面的体系构建,本文选择的案例为财政学,因为学社学者出版了较为丰富的财政学论著,对中国财政学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未进一步补充金融学体系主要是出于文章篇幅有限以及文献资料收集的考虑,学社社员关于一般性的金融学研究较少,更多体现为具体领域的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

⑤ 熊金武:《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⑥ 赵兰坪:《研究经济学的几个基本条件》,《银行通讯》第19—20期(1945年)。

国先哲谋全民幸福所示之学理”。^① 赵兰坪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养民”，“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目标，实现经济平等为理想”。在研究范围方面，民生主义经济学除了“纯粹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涵盖“事实的观察，现象的说明，更进而探求事实发生现象变化的因果关系”。在更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民生主义经济学，“生产与分配并重”。此外，也谈及“民生主义经济学，超然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外，自成一家之说”，其所得的结论，“富于时间性空间性”，揭示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的自立性与特殊性。^② 楼桐孙则认为“民生经济，应该是含有世界性的”，^③反映出其具有推行于世界的普适性。在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方面，社员罗敦伟指出“除开实施计划经济以外，民生主义也没有方法实现”。^④ 陈长蘅则提出“对于国家经营的事业应施行计划经济，对于个人经营的企业则施行统制经济”。^⑤ 陈氏认为国营事业与私营事业应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许更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需求。

社员祝世康于1943年发起设立民生主义经济学社，极大地推进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研究，被夏炎德称许“在目今经济学界，从事阐扬民生主义者，颇不乏人，中以祝世康先生工作最力”。^⑥ 他在民生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以“哲学渊源—方法论—经济原理—政策应用”为构成的较为完整的民生主义经济学体系。祝氏致力于探寻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渊源，指出民生是从整个国家民族方面去考察经济，不以个人为对象，所以是中国“国计民生”思想之一贯的表现。民生主义把经济当作手段，将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经济的目的，所以是中国“经世济物”思想之一贯的表现。^⑦ 在方法论方面，祝世康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是拿个人主义做一贯的思想，以私利的个人经济为单位”，至于民生主义经济学，则是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以“社会的全体利益为出发点”。^⑧ 在经济理论方面，他阐述了民生主义的生产论与分配论，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方式的缺陷进行修正，并有着较深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印记。^⑨ 他也论及“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说，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中可以另开一页的”，^⑩并且民生主义的经济思想体系“应当推行于各国，使成为普遍的新经济制度”，^⑪这显示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自立性与普遍性。此外，他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涵盖经济制度、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工业政策与劳动保险制度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经济政策体系。由此可见，学社社员在民生主义经济学体系构建层面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探索。

总括而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在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探索实践中，初期主要是吸收和发展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力图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并带有明显的西方经济学四分法体例的研究色彩。而后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时并不具备普适性，对根植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一些经济问题难以提供助力，学社社员便走上了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探索新范式的道路，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具备本土性与系统性的民生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思想渊源方面，注重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经济思想的有益成果；研究目的重在养民，改善民生问题；研究方法上摒弃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主张整体主义方法论；研究对象侧重于中国的生产与分配问题；具有较强的政策倾向，涉及经济制度、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工业政策

① 徐青甫：《草创民生主义经济学以符建国方针论》，《金融知识》第2卷第4期（1943年）。

② 赵兰坪：《民生主义经济学论》，《经济论衡》创刊号（1943年）。

③ 楼桐孙：《三民主义经济制度指导原理试论》，《时事类编》第61期（1941年）。

④ 罗敦伟：《民生主义与计划经济》，《军事与政治》第1卷第1期（1941年）。

⑤ 陈长蘅：《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及统制经济》，《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⑥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93页。

⑦ 祝世康：《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经济论衡》第1卷第4期（1943年）。

⑧ 祝世康：《民生主义经济思想的体系》，《财政评论》第13卷第4期（1945年）。

⑨ 祝世康：《从经济原理解释民生主义》，《时事类编》第41期（1940年）。

⑩ 祝世康：《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与经济学说》，《三民主义半月刊》第6卷第2期（1945年）。

⑪ 祝世康：《民生主义经济思想的体系》，《财政评论》第13卷第4期（1945年）。

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可自成一家;在特殊性与一般性方面,有的强调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特殊性,而有的则认为其具有普遍性,可推行于其他国家。学社社员在民生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基本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这主要得益于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在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使相关研究具备共同的理论基础。而深受欧美经济学理论影响的中国经济学社社员能够从单向的借鉴西方经济学范式走上独立探索新范式的道路,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2. 中国财政学体系探索。财政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当时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财政问题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学社的重点考察对象。^① 贾士毅1917年出版的《民国财政史》是学社内较早的研究成果,并获得了高度评价,“是书之成,其庶几通古今中外之邮,我国财政之得成为独立科学,或借是以为椎轮矣乎”。^② 该书注重考察民国时期的国家财政实况,包括国家与地方财政划分、财政政策、财政收支、整理税制、公债现状、预算决算等,并谈及其研究之旨是能够成为财政政策之参考,“使国计之沿革,新政之设施,已著之成效,未来之伟画,一一贡献于吾国民之前,于以察既往审将来,立永久之大纲,采精当之良策”。^③ 贾士毅尽管未明确提出中国财政学,但是他对于中国财政成为独立科学做了先行探索,在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方面为中国财政学提供了理论元素。

至20世纪20年代,学社社员出版了一些财政学论著,如寿景伟的《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杨汝梅的《民国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魏颂唐的《财政学撮要》(浙江经济学会1928年版)、李权时的《财政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关于中国财政学的探索也获得初步发展,寿景伟认为在财政原理研究方面,应“详考事实,综合比较以明其变迁,探其因果而求其通则”;在财政政策研究方面,应“注重民生,斟酌时宜,以解决各种实际上之财政问题”。^④ 该观点强调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财政原理与财政政策,财政原理追求一般性的理论,财政政策则讲求因时制宜,且具有民生导向。魏颂唐谈到各国的财政有历史地理之不同,各国的财政学说及理论亦有其差异,“故吾人欲研究财政学,不就我国之事实现状,分别考证,则学说虽连篇累牍,亦不易抉其症结所在而阐明之”。^⑤ 这个观点一则强调了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再则明确了应以中国人的立场进行研究,三则论及了研究对象应该是中国的财政现状。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财政学研究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累积了可观的学术成果,如社员刘秉麟的《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姚庆三的《财政学原论》(大学书店1934年版)、朱僊的《中国财政问题》(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尹文敬的《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何廉与李锐的《财政学》(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杨汝梅的《财政论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董修甲的《市财政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这个时期也涌现了关于中国财政学的阐释与探讨。朱僊明确提出了“中国之财政学”是“将整个之中国财政问题,加以科学的系统的研究”,^⑥主张中国财政学应具备科学性与系统性,其研究对象是整个的中国财政问题,涵盖收支均衡、公债整顿、租税问题、币制改革等领域。何廉指出一味照搬移植西方财政理论,会致使思想陷于分歧,学术沦于附庸,“欲促进今日中国学术,应先提倡本

^① 《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第273—290页)一书有专节论述了财政问题,系统介绍了学社的财政出版书籍、财政学家以及几位代表人物的财政思想,为本文资料的挖掘提供了很大启发,但其未论及中国财政学构建问题。本文认可“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进而围绕中国财政学构建展开论述。

^② 熊希龄:《序》,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2页。

^③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序”第3页。

^④ 寿景伟:《财政学》,第3—4页。

^⑤ 魏颂唐:《重刊财政学撮要序》,《财政学撮要》,第1页。

^⑥ 朱僊:《中国财政问题》,“绪论”第1页。

国化之社会科学”，^①他强调财政学研究应包含中国内容、具有中国特色。李权时曾表示，他撰写《财政学原理》的动机是提倡国货教科书，指出租税系统中的受益税系统与能力税系统已进入了第三期阶段，即“与洋货逐鹿于世界市场”，并进一步“盼望这本《财政学原理》能够做一些综合整理的工夫，把我的财政观念做成一个有系统的贡献”，^②上述观点反映出李氏对于建构中国财政学、中国财政学在世界财政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中国财政学研究应注重体系性的企盼。

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作为近代中国财政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侧重考察中国财政实践，第一篇从中国特色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讨论预算与决算，第二篇探讨了中国税制与赋税体系，余下各篇分别论述了中国的征实与专卖、公债状况、地方财政、税制改革，构成了中国财政学体系的探索。马寅初在书中尤其强调，财政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需注意本国的实际情况、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中国财政学历经20世纪初的奠基时期、20年代的萌芽时期、3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40年代的深化时期，其在近代的萌生与发展呈现出一个由浅及深的延续与递进过程。在与西方财政学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同时面临着解决中国财政问题，服务于中国财政改革的现实需要，以及财政学本土化的理论需求，推动着中国财政学走向独立探索与发展之路。学社社员从不同方面明晰了中国财政学的理论要素，并基本达成了中国财政学有其特殊性的共识：在研究主体方面，应秉持中国人的立场；研究目的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现实财政问题，成为政府财政决策之参考，改善财政困境与民生问题，精深中国财政学研究以与世界财政学并驾齐驱；研究方法上除了借鉴西方的演绎法与归纳法，也注重中国财政史与财政思想史的传承；研究形态上应具备系统性与科学性；研究对象为中国财政问题、中国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政策；在具体的研究内容方面则呈现出纷繁各异的特点，但基本是立足于中国财政实践，围绕中国财政问题展开系列研究，涉及财政收支、税制改革、公债问题、预决算、地方财政等领域。

3. 工业化思想体系探索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近代，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工业化建设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即：只有循着工业化这条路径，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国防力量。^③ 对于中国如何走向工业化的时代发问，学社社员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也成为探察中国工业化问题与研求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力量。社员在撰写著作方面，于20世纪30、40年代涌现出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有方显廷著《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工商部工商访问局1930年版）、《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马寅初著《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吴景超著《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刘大钧著《中国工业发展之方针》（国民经济研究所1941年版）、《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刘鸿万著《工业化与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工业化与中国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谷春帆著《中国工业化计划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中国工业化通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这些著作围绕工业化内涵、工业化目标、工业化途径、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关系、工业化下的产业发展重心、工业化与社会制度、工业化与资本问题、工业化与劳工问题、工业化与对外贸易、工业化与战后经济等主题开展系列研究。

在工业化内涵、目标与途径方面，刘大钧认为工业化内涵是“各种生产事业机械化及科学化，而其组织与管理亦科学化及合理化”，工业化不是单独发展工业，而是实现工业与农业、贸易、交通、人

^① 何廉、李锐：《财政学》，“引言”。

^② 李权时：《财政学原理》，“自序”第1页。

^③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第5页。

口、金融等行业的协调发展。^① 张素民也指出,“工业化者,适用机器及科学方法于一切生产事业之谓也。不仅制造业应如此,农业运输业等亦应如此”。^② 刘鸿万提出工业化之目标“不外在增加生产与改进人民之生活”。^③ 李培恩论及工业化建设中需具备资本、人工和原料三个条件。^④ 吴景超也从资本筹集、人才培养、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以及同业组织的作用等方面出发,探寻工业化之途径。^⑤

在工农业关系方面,学社社员基本形成了工业与农业应协调发展的一致观点。章乃器质疑了殖民地自由主义者将农业与工业对立化的观点,在坚持“以工立国”的同时,也提出“现代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的工业化”“农业也依然离不了工业”。^⑥ 在谷春帆看来,中国工业化是在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工业化,农业改进是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工业化也是农业改进的前提,“工业之建设,应当与农业改良随同而来”。^⑦ 马寅初论及中国的四大事业,认为银行、交通、工业与农业“四者互相辅行,才能共存共荣”。^⑧ 上述观点体现了工业与农业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工业化视角下的产业发展重心方面,方显廷指出中国乡村工业“在中国未来建设上之地位,不能忽视”,其具有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可“助长中国之国家生命”,^⑨体现出方显廷对轻工业的重视。而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防工业的薄弱,使国人意识到国内发展重工业的迫切性。在此背景下,方显廷也发生了由重视轻工业到重视重工业的思想转变,在1939年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⑩ 谷春帆则谈到不能片面倚向重工业发展,强调各工业相互关系之配合的重要性,重工业建设需考虑“能否与一般工业发展情形相配合”。^⑪ 相较而言,谷春帆的观点不偏不倚、更为客观。

在工业化与社会制度方面,方显廷主张“政府对于生产事业,尤其工业之投资,应加统制”,矫正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投机性或浪费性事业,“一反以往之放任政策,而仿效德国之严格统制”。^⑫ 刘大钧谈到,“既不愿有极端的统制与一元化,亦不希望理想的自由与完善的竞争”,其主张的计划经济在于“有意识有组织的指导”,确定“吾国经济生活所应受计划与统制的性质与范围”,而非“政府统制一切经济行为”。^⑬ 在谷春帆看来,“中国工业化”,“既有目的,必是有计划的”,他根据国家建设发展阶段的不同指出,在第一期的建设中“计划统制气味最重,而自由放任气味最轻”,“最注意于基本工业之发展,而最看轻民生工业”。经过二、三期的建设以后,“国家计划统制指导的成分,即可逐渐减少”,“放任经济是渐增重要的项目”。^⑭ 可见,学社社员并未简单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或英美的自由经济,其所主张的计划论更具有混合经济的色彩。

关于工业化与资本、劳工、对外贸易与战后经济问题,方显廷指出“工业资本之未能自给”,“均为外资利用而不能利用外资”,是“工业进展迟滞”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⑮ 可见,资金筹措对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吴景超估算工业化资本需要“筹集数十万万元的款项”,一方面可以通过外汇筹集,

① 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第3页。

② 张素民:《刻不容缓之工业化》,《民治评论》第1卷第2期(1932年)。

③ 刘鸿万:《工业化与中国人口问题》,第1页。

④ 李培恩:《吾国工业化之先决条件》,《浙江经济》第2卷第1期(1947年)。

⑤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

⑥ 章乃器:《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改进》第5卷第10期(1942年)。

⑦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83页。

⑧ 马寅初:《吾对于经济建设之意见》,《银行周报》第19卷第32期(1935年)。

⑨ 方显廷、吴知:《中国乡村工业》,《经济统计季刊》第2卷第3期(1933年)。

⑩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第64页。

⑪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84—85页。

⑫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第65—66页。

⑬ 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第10—12页。

⑭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13,22—23页。

⑮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第1页。

包括国内农产品的输出、吸收华侨投资、吸收外资等；另一方面通过国内资金筹集，包括税则改良、发行建国公债、加增各种经济事业的生产等。^① 刘鸿万谈到，“工业化之发展，劳力之供给，实为其一重要条件”，虽然中国人口庞大，但“事实上此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为农业人口”，需要将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上所需的工人，还可通过“工业之地方分散化与农村工业化以利用农村之劳工”。^② 方显廷阐述了工业化对国外贸易和贸易政策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中国工业之进步”促使了出口货物由原料向半成品或制成品的转变，进口货物则与此相反；其二，主张“采用保护政策以培养中国现在幼稚之工业”，需重视关税保护的作用。^③ 刘大钧认为轻工业与重工业、集中与分散、政府与企业、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应是战后经济中工业发展方针的考量因素。^④ 这显示出学社社员对于中国如何走向工业化进行了较为细致与深入的研究。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学社社员关于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工业化内涵方面，强调生产的机械化与科学化，重视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工业化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生活之改善，反映了民生导向。在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上，达成了工农业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基本共识。在工业化视角下的产业发展重心方面，则显现出歧见与差异，如有些观点在战前倾向发展轻工业，在战后转向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有观点否定了发展某种工业的孤立性与片面性，应当注意各种工业之间的协调建设与相互配合的问题。在工业化与社会制度方面，基本认识到完全的计划经济与自由放任政策均不适用于中国，故而有观点主张实施统制经济，表现出混合经济的特征。工业化资本筹措需要关注外汇与国内资金的筹集。工业化的劳动力供给应促进农村人口向工业劳工的转变。国内幼稚工业的培养需要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战后经济中如何推行工业化应注意工业与农业的配合、各工业之间的配合、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协调等。

学社社员关于中国工业化研究的学术观点收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美国经济学家特雷斯科特(Paul B. Trescott)长期关注中国经济问题，肯定方显廷关于中国的工业化研究极具价值，是学术研究的标杆，并认为他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之前的发展经济学家。^⑤ 有学者指出，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将中国近代工业化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⑥ 谷春帆的工业化研究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其经济发展理论基本涉及了发展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并且其“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理论，可以与刘易斯等发展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相媲美。^⑦ 基于工业化理论与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依据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的定义，^⑧也有学者把上述学社社员连同张培刚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工业化理论的深入探索和体系构建成果看作是近代中国发展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指出以工业化为核心。马寅初、吴景超、方显廷、刘大钧、谷春帆、伍启元、张培刚等都从不同角度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学说体系，这标志着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已基本成熟。中国的发展经济学通过张培刚的著名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对西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⑨ 张培刚也有类似的评价：“从

①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第12—25页。

② 刘鸿万：《工业化与中国劳工问题》，第28、34页。

③ 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第84—87页。

④ 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第72—91页。

⑤ Paul B. Trescott, “H. D. Fong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4, No. 4, (2002), pp. 789—809.

⑥ 周建波、熊维刚、吕麒：《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⑦ 孙大权：《谷春帆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⑧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⑨ 参见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李向民：《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世界地位——兼论发展经济学的三个阶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邹进文、李俊：《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三次发展》，《经济动态》2012年第2期。

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比西方经济学家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①这一评价说明了对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的肯定。^②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同时认为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研究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这一案例也说明,基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如今伴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伟大发展历程,积淀了丰富多样的经济建设经验,在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时代呼吁下,我们应当有此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基于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创新,并上升为理论化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创建出中国经济学。

综上以观,中国经济学社在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与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共同作用下,萌生了“成立中国学派”“创一新思想”“经济科学自立”“中国之经济学”的理论诉求。学社社员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并显示出浓厚的学理意蕴,孕育了比较丰富的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与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在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财政学、工业化思想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等方面探寻体系化的理论研究。如果说中国财政学是在与西方财政学的交流、融合与冲突中形成的,带有更多外生性,那么民生主义经济学、工业化思想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则更具有内生性与本土特质。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学界中心组织的中国经济学社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研究具备系统性与代表性特征。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方面,呈现出由浅及深、层层递进的演变路径,并产生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与创新价值的思想观点及经济理论体系。系统考察中国经济学社探索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思想与实践可以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如下有益启示:

第一,紧跟经济学发展前沿,汲取传统经济智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传承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智慧,以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深度与历史厚度。

第二,以政、学、商互动为纽带,汇聚社会各方力量。构建中国经济学,并非凭借一己之力可以完成,要发挥经济学术团体的引领和组织协调作用,借助政界、商界等其他一些群体的力量,增强政、学、商的有机互动,共同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

第三,以高层次平台为依托,培育战略思想大家。要加快搭建具有国际凝聚力的高层次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平台和机制,培养造就一批领军型经济战略家、思想家,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当中国经济问题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中国经济学家具备“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就更容易对中国经济现象进行捕捉解释,从而极大增强中国经济学的世界影响。

第四,以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推进经济理论创新。尽管近代中国经济落后,但基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实践却依旧能产生出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民生主义经济学、工业化思想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等。如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发展经验。因此,我们应当有此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将中国经济实践和发展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助力中国经济学构建,进而提升中国经济学术的国际话语权。

^①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第33页。

^② 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in the 1920s and 1940s

Cheng Lin, Xie Yao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has achieved many important results, but th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s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Based on the four principles proposed by the China Economics Society in 1925 and implemented by its members, this paper makes a panoramic analysis of the society's thought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proces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the China Economic Society presents a logical level and evolution path from theoretical learning to practical evolution, and then to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rom shallow to deep. First, the Socie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ompiling economic books, which is manifested both i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and in the exca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both of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second,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reality Economics, laying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in relate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microeconomic issue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through in-depth economic research.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the China Economic Society can provide many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ics.

Keywords: Chinese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cs Society, Construction of System

(责任编辑:高超群)

《气候变化对清代华北地区粮食生产及粮价波动的影响》出版

李军教授等的新作《气候变化对清代华北地区粮食生产及粮价波动的影响》202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粮食生产更是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对历史时期粮食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性粮食问题。

该书以清代华北平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及粮价波动的影响。方法上,将传统史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相结合,阐述了历史时期华北地区气候变化与粮食种植结构的变迁,同时量化研究了历史文献数据较丰富的清代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及粮价波动的影响,并将市场及政府行为因素,列为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缓冲与补偿因素进行了考量。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体现在长期和短期两个层面:长期来讲,气候变化影响了粮食作物选择、耕作制度变迁和耕地面积变化;短期来讲,气候变化通过旱、涝、蝗等灾害影响了粮食作物的供给。但气候变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有限,因为整合的市场和高效的国家干预行为抵消了气候变化对粮价的影响。

该研究在文献量化整理方面也所贡献。通过整理大量原始资料,重建了清代华北44个府(州)的自然灾害和政府行为序列。其中,自然灾害序列是干旱、洪涝、病疫等8类的府级年度数据,政府行为序列是赏给、减免、缓征、借贷、余粟等5类的府级季度数据。此外,在《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和“清代粮价资料库”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整合形成了1776年至1911年的府级季度小麦价格数据。(杜凯)